

从山水到风水

——阆中古城城市形象的变迁

□吴其付 [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 610068]

[摘要] 阆中古城作为中国风水典范,其形象变迁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先秦至汉晋时期,得山水之利,从山谷之城发展为巴蜀重镇;汉晋至唐宋时期,得山水之美,从琅嬛福地发展为阆苑仙境;唐宋至明清时期,得山水之胜,从堪輿胜地发展为风水典范;新中国成立到现当代,得山水之肥,从丝绸之都发展为风水之都;展望未来,得山水之韵,“山谷之城、风水之都”应为阆中古城新的形象定位。

[关键词] 阆中古城;城市形象;风水格局;形象变迁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13)06-0083-05

引言

城市形象是城市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与区域地位的总体表征。一个地方的城市形象总是随着历史发展与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化更新。很多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城市,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都曾经历过激进突变或渐进裂变的形象变迁。

阆中古城是中国著名的风水古城,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中游,历来为古代巴蜀重镇,有着2300多年的建城史。因其典型的风水格局成为中国城市选址的典范。

历史上,古城阆中城址几多变化,但大都在嘉陵江两岸移动,且与现今城址相距不远。先秦至汉晋时期,由于巴国迁都、秦设县治、汉设郡治,阆中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址设在盘龙山麓至玉台山临嘉陵江台地上。由于受江水冲刷和军事战争破坏,城址在这个区域内不断变动。唐宋时期,城址基本固定并沿用至今,受堪輿风水影响,城市选址特别注重龙、砂、水、穴的细致考察与周密权衡,金城环抱的城市基址与山川形胜景观基本形成。明清时期,在唐宋城址基础上,不断扩大城市规模,街巷走向、城门朝向、公共建筑、衙署建筑等布局刻意迎合风水理论和儒家礼制,“山环水绕”、“环抱有情”的山、水、城融合一体的典型风水意象最终形成。

今天的阆中古城,其城市格局及自然景观较完

整地保留了唐宋明清时期的人文环境与建筑风貌,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阆中古城凭借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与巴蜀重镇的历史地位,与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歙县古城并列为中国四大古城。

当前,阆中古城正在着力塑造中国风水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形象。但阆中古城作为中国城市选址的典型风水模式,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作为区域性的山川重镇,经过人文点化与刻意塑造后天形成的。目前,学界对阆中古城的研究还不多,已有研究集中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1-2]、古城空间格局^[3]等方面,对古城城市形象演变形成的关注不够。本文将通过对阆中古城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解读,揭示其城市形象变迁的重要历程。

一、山水之利——从山谷之城到巴蜀重镇

古代城市生存与延续的基础往往取决于城市的交通区位优势与自然资源要素,其首位形象也多为这二者内容的融合提炼^[4]。阆中地处秦巴山脉南麓,嘉陵江中游,为秦蜀孔道、巴蜀要冲之地。这里土地肥美,物产丰富,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巴蜀要塞、水陆辐辏的独特地理位置,使阆中得山川之利、水陆之便,成为古代川北地区的行政重镇、军事重镇、商贸重镇、文化重镇,多种要素的集合共同形成了“川北首邑”的区域形象。

[收稿日期] 2013-05-13

[基金项目] 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遗产地铭刻时代痕迹与旅游发展研究”(12CJY088)

[作者简介] 吴其付(1976-)男,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最初的阆中,从江边聚落发展而来。新石器时代,阆中先民就在这块土地肥美、物产丰富的地方繁衍生息。西河、东河、构溪河与嘉陵江在此交汇,洄湾处鱼类众多,先民捕鱼为业,并耕种农业,聚落与集市渐次兴起。随着经济发展和水陆交通地位的凸显,城市战略地位逐渐提升,从秦阆中设县开始,阆中就一直成为历代封建帝王统治西南的重镇。

阆中成为古代川北重镇历程,开启于巴国别都。阆中是古代巴人聚集的地方,在商代为巴方,周代为巴子国地,战国后期为巴国别都。巴人是聚集于山谷中的民族。阆中的“阆”字就是巴人语言的音译,巴语中的“阆”本为“浪”,是“山谷”的意思,“阆中”即为“山谷中的城”。“阆”与“浪”古同音,而后世学者又依据阆中城市的山形水势,构建出我们今天的“阆”字,并以此反过来作为阆中名字来源的解释^[5]。由于阆中良好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物产供给,不断迁徙的巴国都邑终于在阆中得享短暂的安定。

阆中成为秦之郡县后,“秦蜀孔道”、“巴蜀要冲”的军事地位与交通地位不断显现,“前挡六路之师,后依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加之山围四面,水绕三方,兼有七关合护^①,进退自如,攻守咸宜。因此,历代的郡、州、府、县、军、路、道等治所皆在阆中城,并多以亲王重臣驻守。

阆中盛产丝绸、桐油、猪鬃、药材,由于水陆之便,商贾云集,阆中成为古代川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战国秦汉时期,陆路交通十分不便,而水上交通相对优越,发源于秦巴山脉的嘉陵江水道便成为秦陇入川的重要通道。到了唐代,蜀地对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嘉陵江水道作用超过陆路金牛道,成为川陕地区商贸往来的主要通道。唐末五代时期,由于战乱四起,四川对外的陆路交通经常受阻,往来客商多从阆中经嘉陵江水道前往重庆,出三峡,再转辗到中原。北宋时期四川的商品经济更加发达,不少商人从利州取道嘉陵江水路到达阆中,并以阆中为中转地,经陆路到达中心城市成都。南宋时期,四川成为南宋政权的重要粮仓,嘉陵江水道长年千帆竞航,百舸争流,十分繁荣。这种水陆交通重镇地位,一直保持到近现代宝成铁路建成之时^{[6]2}。

从巴国别都到巴蜀重镇,阆中作为川北首邑的城市形象主要体现在先秦至汉晋时期。由于秦巴山脉阻隔,蜀道难使得阆中作为金牛道上的军事重镇、嘉陵江水道上的商贸重镇的战略地位特别突出,而三国时期的魏蜀两国军事战争又多在这带展开,更

加强了阆中作为川北重镇的地位。

二、山水之美——从琅嬛福地到阆苑仙境

中国传统城市,镶嵌于良好的山水之间,通过山川之美与人文之美融合贯通,形成“感通天地”的意境美,并以此构建起具有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山水美城形象。古城阆中依山傍水、绚丽多姿,四周群山环绕、关隘相连、山川秀美,自古便有琅嬛福地和阆苑仙境的美誉。

琅嬛福地是人文始祖伏羲赠与阆中的无价之宝,它开启了阆中人杰地灵的智慧之门。相传阆中为伏羲母亲华胥“履巨迹而孕伏羲”之地。伏羲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伏羲特别看重这片孕育他的土地,曾三次回故地阆中,教民渔猎畜牧,并把这里辟为“琅嬛福地”,作为天书藏匿之所,其首藏之书就是含有天文星象之术的先天八卦^{[6]25-26}。天书是人类智慧之书,它赋予了阆中的聪明智慧与人文昌盛。

从伏羲观测天象始作八卦开始,阆中便与天文星象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古以来,阆中便是古代民间天文研究中心。特别是在汉代,阆中天文人才辈出,诞生了以落下闳为代表的民间天文学家群体。汉武帝时期,由于颛顼历法误差很大,朝廷议制新历,征召天下学士。经同乡谯隆推荐,落下闳被征召进京,授官太史侍诏,运用自制浑天仪,通过天象实测,主持完成了《太初历》,被汉武帝采纳,颁行天下,成为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完整历法,对后世的节令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的两汉三国期间,阆中此类奇人异士辈出,代表者如汉成帝时期的议郎官谯玄、汉哀帝时的益州刺史任文公和其子任文孙、蜀汉刘备时期儒林校尉周群、周舒、周巨祖孙三人等。

由于阆中民间天文研究名扬天下,因此成为诸多行家向往之地。东汉时期,道教始祖张道陵追逐仙气而来,在阆中“云台山”、“文成山”筑“元台”观测天象,后来“飞升”于此。唐朝时期,官至火山令、专司全国地理勘舆之职的袁天罡奉旨来阆中,在蟠龙山顶筑“观星台”观测天文。其后,官至太史令、专司天文历算之职的李淳风,仰慕袁天罡而寻访其踪迹,到阆中继续观测研究天文,其子孙也秉承祖业从事天文研究。繁盛的民间星象研究为唐

宋阆中风水意象构建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阆中别名阆苑。阆苑,本是传说中的神仙西王母居住处,是为天界仙境,最早出自《山海经》。从远古神话传说到历代文学名著,从儒雅的饱学之士到坊间的市井草根,都乐以借用“阆苑”代指人间仙境。“阆中”得名“阆苑”,与“昆阆之形”有关,据《日照县志·掇余》卷记:“昆仑山下有横岭,环抱如城郭,旧名小阆苑,取昆仑阆苑之义。”阆苑代指阆中,缘于两地地形地貌极为相似。事实上,古人把阆中比作阆苑仙境,并非自我臆造,“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的阆中,嘉陵江环绕城池,四周青山拥抱,云雾缥缈,楼阁隐现,仙境自然天成。历史上,直接以“阆苑”代称阆中的,应归功于驻守阆中的滕王李元婴。他在兄长李元奎造城基础上,以袁天罡和李淳风的风水理论为指导,仿长安、造宫苑,建五城十二楼,并取名为“阆苑”。而最早通过诗词把“阆苑”与“阆中”联系起来的,是宋代的欧阳修,“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7]

阆苑仙境以锦屏风光最胜。锦屏山被誉为“嘉陵第一江山”,其美景历来为名人雅士所赞。锦屏山位于嘉陵江南岸,与阆中城隔江相对,壁立如屏,花木似锦,故曰锦屏。“每至春日,桃花吐红,李花放白,其灿若锦。”唐代画圣吴道子深醉美景,以锦屏山为中心,一气呵成《嘉陵江三百里绮丽风光图》。“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诗圣杜甫挥毫写下《阆水歌》。宋代苏轼与陆游也毫不吝惜自己对阆中的赞美之情,留下了“阆苑千葩映玉寰,人间只有此花新”、“城中飞阁连危亭,处处轩窗对锦屏”的美景佳句。

从琅嬛福地到阆苑仙境,阆中的山川之美是一种融合了人文与自然的胜迹之美。把昆仑众山的“仙居”与帝王宫阙的“皇居”合二为一,构建出天人合一的人间至美之境。从智慧天书到天文历书,从人间闹市到神仙居所,阆苑仙境作为汉晋至唐宋这一时期的城市形象,处处渗透着“感通天地”的独有景致。而天文历算与堪舆地理的密不可分,又隐隐昭显出从阆苑仙境向风水典范的过渡之象。

三、山水之胜——从堪舆胜地到风水典范

从唐代开始,阆中城市形象在渐变与突变的交替作用下,出现华丽转身,从历代的巴蜀重镇转为后代的风水典型。这种转型历经宋代,直至清初最终完成。汉唐时期的阆苑仙境已为城市形象的渐变

打下了基础,而唐宋时期风水术语与风水技巧的直接运用则为城市形象突变添加了催化剂,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阆中风水典范的城市形象形成。

阆中风水环境的选择及城市风水景观的演变,与汉唐时期天文学家的活动息息相关。自汉及唐,风水堪舆之学盛行,许多天文学家又同时为风水家,袁天罡和李淳风便是典型代表,被尊为风水大师,他们精于风水并使阆中深受影响。唐以后阆中城市选址与自然山川有机谐和的风水格局形成,都和袁天罡、李淳风的风水堪舆活动与影响分不开。

阆中作为城市风水意象的典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城市选址本身符合中国传统城市的选址要求,二是城市地理环境与风水“形势宗”的龙、砂、水、穴极为相配,三是城市建筑布局刻意迎合山川形胜与儒家礼制,注重趋利避害,祈福纳吉。从阆中成为风水典范的条件来看,前者是基础条件,中者是优势条件,后者是主观条件。

中国先民很早就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的城市选址与营建的理论学说,一个城市要生存与发展,在选址与规划上必须符合以下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具有适中的地理位置,符合择中观;二是度地卜食、体国经野;三是国必依山川;四是设险防卫;五是水陆交通要冲^[8]。阆中作为巴国别都和巴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区域地理中心,与“五服”制度或“九服”制度相吻合;而“阆中”的“中”字,是择中观的典型体现。阆中土地肥饶、气候温润、物产丰富,符合度地卜食、体国经野的城市生存发展要求。阆中城依山傍水,处于大山之下、广川之上,具有良好的环境格局,符合国必依山川的要求。城市四围重重天然屏障合护,关隘相连,成金汤之固,利于设险防卫。城市位于古米仓道、金牛道、白龙江、嘉陵江水陆要冲之地,得车舆舟楫之利,商贾辐辏、都邑繁华。

中国传统的选址理论学说历经秦汉的经学教化与道器分野,被江湖术士吸纳糅合,成为“形法”、“堪舆”之术,并最终形成影响中国至深至远的风水理论,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城市建设。古城阆中也不例外。

作为城市地理环境风水意象的典范,古城阆中的山水配置最典型、最完整、最准确地体现了风水格局所需的龙、砂、水、穴意象、构成了“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四象格局与“山环水绕”、“环抱有情”理想人居模式。

古城阆中典型的地理环境意象主要表现以下四

个方面^[9]。

主山与龙脉：蟠龙山为阆中主山，是古城山川形势之依靠，由近及远形成连绵不绝的龙脉意象，而县城则为龙脉聚合之处。

青龙与白虎：古城东面的梁山、七家山、大像山与西面的西山构成“左青龙，右白虎”格局，前后左右群山环抱，与龙脉形成呼应烘托之势。

案山与朝山：锦屏山作为“案山”，与古城形成隔江对景之势，成为城市第一道屏障，锦屏山之后的印斗山、金耳山，形成层次丰富的朝山系列。

冠带水与水口山：嘉陵江从东、南、西三面绕城而过，以“冠带水”形成“金城环抱”的大吉意象。西山与玉台山隔江对峙形成“天门”和“上水口”；东南的交通要道与塔山形成“地户”和“下水口”，共同构成古城“气口”。

风水在注重因地制宜的规划利用自然条件之时，还强调具体环境场所的创造。通过因其自然之性，假以人工裁成，实现“趋全避缺，增高益下”之目的，达到“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的至善境界。这为城市建筑布局的风水意象构建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具体而言，即是在建筑布局上，明确功能器用与儒家礼制，追求人文建筑与山水融合的风水美学意象。古城阆中深谙此理，其城市街道布局均与传统风水城市营建思想相契合。

古城阆中建筑布局的风水意象主要体现为：

城市总体布局：以中天楼为中心，形成“十”字形主干大街，并向东南西北四面展开，各街巷与远山朝对，街名与之相对应。

城市功能分区：西北面布置宗祠官署，为道府、学府和达官贵人活动区；东北面布置军事要塞，占据城池较高地势，居高临下，控制全城；城南面临嘉陵江，布置商贸区和居住区，便于通商和起居生活。

城市人文培植：接纳东南生气，将南门东渐、东门南移，建南津关和华光楼扼守，象征财源广进、财富聚集。倡导文治教化，城内建文庙、学宫、书院，城外筑文峰塔、奎星楼于水口山，既增高增势，又象征文运昌盛。

城市公共建筑：社稷坛、先蚕坛、先农坛、火神祠、水神祠、龙王庙与城市行政、居住建筑与世俗活动保持密切关系又适度分离，达到凝聚人心与宗教震慑的双重作用^[10]。

经过唐宋时期的风水奠基，到明清时期的刻意追求与规模扩充，阆中古城典型风水格局最终形成，

并保留至今。

四、山水新生——从丝绸之都到风水之都

从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国成立，对科学民主的追求以及现代化的向往，让人们不再津津乐道于阆中风水意象的神奇与典范，而是更加关注于经济发展对贫穷落后面貌的改变。蜀道交通的逐渐改善带来阆中舟楫之利的逐渐丧失，新的发展方向尚未明确，城市形象进入了暂时的模糊期，而这种模糊正是那个时代风云变幻的真实写照，整个民族都在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城市也处在多种发展趋向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施工业强国之策，阆中工业经济也开始随着国家节奏阔步前进，丝绸产业快速崛起并成为城市新的形象代言人。阆中盛产丝绸有着悠久历史，唐代时期阆中丝绸就成为朝廷贡品。而新的缫丝技术与机器化的规模生产，将阆中丝绸产业推上了一个新高峰。丝绸生产规模名列全省前列，丝绸产品成为国家重要的出口商品，阆中成为川东北的丝绸之都^[11]。但好景不长，日益残酷的市场竞争、粗糙落后的生产技术、僵硬死板的管理水平，最终阻碍了阆中丝绸产业的更大跨越，工厂倒闭、员工下岗，丝绸产业在阆中经济中的辉煌地位渐渐退却，丝绸之都美誉也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古城历史文化与风水价值被忽略，传统建筑被视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障碍而被拆除，风水城市格局被视为封建迷信无人敢提及，许多新的现代建筑将古城风貌特色步步蚕食，古城规模也急剧缩减。

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60年代人们对历史人文资源的蓄意破坏，90年代急功近利的大规模古城拆迁之后，阆中古城迎来了新生。随着丽江古城、平遥古城在古城保护开发中获得巨大成功，阆中古城的旅游价值被提到新的高度，这为古城的保护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从20世纪末期开始，国家和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古城保护的法律法规，如《阆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等，确定古城的保护重点是山川风貌、古城格局及传统街区和文物古迹。整治历史性街区、风景名胜区，修复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古迹，使之既能反映城市文化内涵和“金城环抱”的古城格局与风貌，又具有突出的地方特色^[6]。风水作为阆中古城独有的文化价值和与人地和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借鉴，再一次被人们津津乐道并作

为旅游产品推出。

发展旅游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以风水格局为特色的阆中古城。从1996年开始,阆中古城进入了新的恢复发展期,山川风貌、古城格局、传统街区、文物古迹得到修复,不协调的现代建筑被拆除,“三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浑然天成的风水格局重新出现。

进入新的世纪,风水文化之都作为城市新形象被媒体强化^[12]。“阆苑仙境、风水宝地”、“走进神奇阆中、畅游风水古城”、“嘉陵第一江山、风水古城阆中”、“中国风水第一城、科举圣殿状元乡”、“春节发源地,风水阆中城”等旅游宣传口号,把风水作为重要内容对外推广。旅游得到快速发展,到2010年,来阆中古城旅游的游客超过250万人,旅游产业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作为风水之都的形象载体的阆中古城,未来将肩负着把阆中建设成中国风水文化旅游目的地、中国西部最具吸引力的旅游城市、川东北旅游中心的历史重托^[13]。

五、结语:寻找城市新形象

近年来,随着兰渝铁路、广南高速、绵巴高速的规划建设,阆中对外交通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同属于川东北地域的城市广元和南充的现代交通网络相比,阆中在地域交通中仍然居于劣势。未来的阆中,不得不面对经济区位的边缘化的挑战,但风水古城的存在,赋予了阆中成为区域性旅游新中心的机遇。在川东北区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特色最浓、文化最深的古城,就只有阆中古城。近年来旅游知名度的快速提升和旅游者的络绎不绝,也证明了阆中古城具有很大的市场号召力。因此,依托古城及周边资源,大力发展旅游是阆中未来成为区域性旅游中心的关键。

阆中古城包含了巴渝、天文、风水、三国等多元文化,这为城市形象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目前阆中古城的旅游形象主要围绕着风水古城做文章,内涵显得较为单一,没有完全体现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其实巴文化是阆中古城应着力展现的文化内涵。阆中是巴人集聚地,曾为巴国别都,阆中名字的由来就与巴语有关,巴渝舞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巴文化又和巫文化联系紧密,巫文化又包含了天文星象和阴阳五行等风水内容,因此,阆中旅游在未来发展中,应以“山谷之城、风水之都”作为城市形象的新定位。山谷之城既能体现阆中的巴文化特色,又能展现出古城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注释

① 七关为:南津关、五吉关、河溪关、梁山关、锯山关、土地关、滴水关。

参考文献

- [1] 付蓓,李秀,等.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原则中“原真性”的思考——以四川阆中古城保护为例[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0(4):20-23.
- [2] 徐东文,王颖凌,等.基于CVM的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以历史文化名城阆中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40(4):46-48.
- [3] 王伟,董靓.历史遗产可持续发展模式与策略研究——以历史文化名城阆中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3):27-30.
- [4] 张晓夏,王静.阆中城市形象演变分析[J].山西建筑,2007,33(28):52-53.
- [5] 毛明文.阆中揽胜[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3:1-2.
- [6] 何一民,范瑛.阆苑仙境——历史文化名城阆中[M].成都:巴蜀书社,2005.
- [7] 王萌.守望吾土吾乡: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阆中[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106-107.
- [8] 威珩,范为.古城阆中风水格局——浅释风水理论与古城环境意象[C]//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
- [9] 李小波,文少琼.四川阆中风水意象解构及其规划意义[J].规划师,2005,21(8):84-87.
- [10] 刘涛,李秀,等.四川阆中古城空间形态分析[J].规划师,2005,21(5):116-118.
- [11] 曾绍义,赵春藩,等.阆中天下稀[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172-175.
- [12] 史幼波.阆中——中国风水文化之都[J].中国西部,2004(3):10-15.
- [13] 周兴茂,张晶晶,丁益.论巴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3):99-105.

(下转第103页)